

#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张 良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宋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关键词 以才学为注 阐释学 客观笺注 主观心解

中图分类号 J206.2/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3)01—0183—05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肯定盛唐诗歌,批评宋代诗人的创作,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sup>[1](P26)</sup>严羽所谓的“以才学为诗”,被后人理解为主要就是指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要求作者能熟练运用各类书籍中的语言材料,并加以改造,使之与诗意完美融合,用之犹如己出。苏轼、黄庭坚都主张创作须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苏轼《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sup>[2](卷57)</sup>《山谷内集诗注》卷十一《再次韵杨明叔诗序》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sup>[3](卷12)</sup>苏轼认为“用事”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用事亦即用典。黄庭坚未专指用典,但所言“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却和灵活化用古今各种语言材料大有关系。

被严羽称为“元祐诸公”的苏、黄、陈等人在创作中表现出“以才学为诗”的特点,相应地,宋人在对他们的诗集进行注释时就需要“以才学为注”。注者在注释时须将诗人

化用在诗歌中的事典、语典一一注出,难度极大,极需才学,故对应于诗人的“以才学为诗”,我们将这一现象统称为“以才学为注”。

宋人“以才学为注”主要是指本朝人为本朝诗集作注,宋人注宋诗最有名者是对王、苏、黄、陈四家诗集所作之注。其时注本朝诗集风气极盛,如注东坡诗就有《八注》、《十注》之说<sup>[4](P2833)</sup>。这些注释作品至今尚有不少流传,如任渊《山谷诗内集注》、《后山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李壁《王荆公诗注》,胡穉《简斋诗注》,等等。

## 一、“以才学为注”的具体做法

1. 释事解典。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指出:“对在对话中要出现的事物所具有的理解,必然意味着他们在对话中已获得了某种共同的语言。”<sup>[5](P120)</sup>注者进行注释,也就相当于同作者进行对话,而要与王、苏、黄、陈等诸位才富学博

收稿日期 2012-10-14

作者简介 张良(1977~),男,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的诗人进行对话,要具备与他们共同的“某种语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宋人的诗注里这类对注疏难度描述的材料很多。钱文子《鄞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云:

夫读古人之书,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固非区区采之简册而后用之也,而为之注者,乃即群书而究其所自来,则注者之功宜难于作<sup>[3](P499)</sup>。

要一一探寻作者所引材料之来处,已属不易,更何况高明的作者有的引用犹如己出,因此,注者注释的难度甚至超过作者创作的难度,这也确是识者之言。但是注者与作者依然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性,只要他们可以如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拥有“某种共同的语言”。

美国学者赫施认为:“诠释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他自己身上重建作者的‘逻辑’,重建他的态度,他的文化教养——简言之,他的世界。即使这一证明过程高度复杂和困难,最后的证明原则却非常简单,那就是对说话者作想象中的重建。”<sup>[6](P243)</sup>同样,对于宋代的这些阐释者而言,他们如果想要能够完美地进行阐释,首先就必须具备与作者相当的才学,然后才能真正完成与文本的对话,与作者的对话,大致相等的才学,可以理解为即是他们对话的共同语言。史容为了注释《山谷外集》,“上自六经、诸子、历代之史,下及释老之藏、稗官之录,语所关涉,无不尽究”。最后“于山谷之诗,既悉疏理,无复凝结,而古文旧事,因公之注发明者多矣”<sup>[3](P499)</sup>。《鄞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其注诗的过程颇类似于“以才学为诗”的创作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史容注诗之时多有发明,尽管山谷诗中经常引用一些冷僻材料。

赵夔《注东坡诗集序》云:

东坡先生读书数十万卷,学术文章之妙,若泰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窥测藩篱,况堂奥乎!然仆自幼岁诵其诗文,手不暂释。其初如涉大海,浩无津涯,孰辨淄涅泾渭?而鱼龙异状,莫识其名。既穷山海变怪,然后了然无有疑者。崇宁年间,仆年志于学,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来历,必欲见其用事之处。经史子传,僻书小说,图经碑刻,古今诗集,本朝故事,无所不览。又于道释二藏经文,亦常遍观抄节,及询访耆旧老成间,其一时见闻之事,有得既已多矣。顷者,赴调京师,继复守官,累与小坡叔党从游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党亦能为仆言之<sup>[4](P2831)</sup>。

赵氏自叙其诵读苏轼诗文的前后变化过程,其实亦是其才学积累之过程,其不但阅读各种书籍,而且访诸“耆旧老成”,以便得到与作者或文本相关之事,并且还于苏轼幼子

苏过交游,常相请教。赵夔注苏诗的过程确实相当于赫施所说的“对说话者作想象中的重建”的过程。尽管开始时才疏学浅,“如涉大海,浩无津涯,孰辨淄涅泾渭?而鱼龙异状,莫识其名”,其时虽尚难窥测作者之藩篱,但是,“既穷山海变怪”,等到阅历丰富,学识宏博,才学积累到与作者相当程度之时,再来阅读苏轼诗文,“了然无有疑者”,已可直睹作者之堂奥。可见只要积累与作者相当之学问,双方即可以进行平等对话,完全可能对诗歌进行注释。如《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sup>[9](卷3)</sup>是黄庭坚的一篇代表作品,其运用典故之多、手法之高明,如不借助注释,一般读者根本难以了解其妙处。全诗虽只有五言八句四十字,但任渊在作注时,一共涉及到了17种书籍,其中《晋书》和《文选》还出现两次,所引语言材料多达16条,共600余字。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任注,黄诗几乎难以理解,正是通过任注,才可以获晓黄诗中那些丰富的内容和巧妙的手法。

同时,以才学为注,乃是本朝人注本朝诗,注者去作者未远,因此,他们获取诗歌创作的缘起或者本事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结合史料,联系本事,再依此来对典故进行阐释,就挖掘出了典故背后所蕴藏的深意,同时也展示了作者高明的用事技巧。如苏轼《送刘放倅海陵》诗云:“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萊宫。秋风昨夜入庭树,蓴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sup>[7](卷3)</sup>诗中多引事典和语典。开篇引用阮籍和张仪二典,似指不应多言,可多饮醇酒。但通过阅读题下施注,对诗意理解就深刻多了,注曰:“刘放,字贡父,临江新喻人。与王介甫论新法不便,介甫怒,斥通判泰州。”<sup>[7](卷3)</sup>通过施注,可以知道刘放因为论新法之不便,激怒王安石而被贬海陵通判,这样读者就清楚了苏诗所引典故乃是针对时事而发,极有深意,而非泛泛资书炫耀学识。又如《送刘道原归觐南康》,施注曰:“此诗端为介甫而发,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张汤况介甫。又云‘虽无尺箠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益著其面折之实也。”<sup>[7](卷3)</sup>这里今事与古事融为一体,如盐如水,读者也是通过注本方能领略诗人化用典故议论当今之事的巧妙手法,并由此而理解诗歌的深意。正如汪辟疆先生所说:“宋人如施元之注苏,任渊注黄、陈,李壁注荆公,胡穉注简斋,以宋人而注宋人诗,故注中于数典外皆能广征当时故事,俾后人读之,益见其用事之严。”<sup>[9](P670)</sup>

由上可知,只要注者积累了与作者相当的渊博学问,

就可以对作者的世界作想象中的重建 和作者进行有效对话 进行文本阐释时旁征博引,“沿波讨源,虽幽毕显”<sup>[9](卷10)</sup>,不但能注明典故出处,同时还联系作者当世之事,将典故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揭示出来,这样就作者用事之巧妙和文本之后的幽隐之意相当精彩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2. 主观心解。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一书中对赫施的意图论阐释学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包含着一种来自批评家的主观性因素,因而不可能成为赫施所要求它成为的“客观性批评”<sup>[10](P194)</sup>。但是不同于赫施的意图论阐释学,宋代的这些注释者在通过对文本进行笺释的同时,他们并不排斥注释者的主观性,而是充分肯定注释者的主观参与。

任渊《后山诗注目录序》:“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此诗注所以作也。”<sup>[11]</sup>《后山诗注》卷首任渊认为阅读陈师道的诗作的过程类似参禅,通过“冥搜旁引”,对诗作引用材料进行阐释,最后方可悟得文本之后深藏的作者用意。

魏了翁《王荆公诗注序》:“石林李公曩寓临川,嗜公之诗,遇与意会,往往随笔疏于其下。……则诗注之作,虽出于肆笔脱口,若不经意之余,而发挥义理之正,将以迪民彝,厚世教。”<sup>[12](P)</sup>魏了翁指出李壁注王安石诗作之时,重己之意,强调自己的主观性。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宋人注杜诗之中。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卷首吴文《补注杜诗跋》:“山谷尝谓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第恨后人读书少,不足以知之。今生乎数百载之后,欲探古人之心于数百载之前,凡诸家笺注所未通者,皆断以己见,自非胸中有万卷书,其敢任此责耶?”<sup>[13](P4)</sup>黄氏在笺注时遇有他注解不够通达的地方,都运用自己的经验进行裁断。

到清代,仇兆鳌注杜诗“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但同样重视“反覆沉潜”。《杜诗详注序》云:“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稍乎有余思也。”<sup>[14](P2)</sup>仇氏认为在旁征博引、探讨典故源流之后,还须借助“反覆沉潜”,由文本而后进入作者的世界,得作者千百年之前的“苦心”。这就将客观笺注和主观心解完美结合,作品阐释的任务也就顺利宣告结束。

## 二、“以才学为注”出现的原因

通过考察,笔者发现,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

法的出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 文本原因。按说宋人理解本朝诗歌,基本不存在时间和空间距离的障碍,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王安石到苏轼、黄庭坚,以才学为诗可谓臻于极致。他们本人往往既是诗人,又是学者,有多方面的成就,他们以才学为诗相号召,并且身体力行。严羽批评近代诸公以才学为诗,主要就是指元祐诗坛苏、黄、陈等人诗歌创作中大量用典,“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sup>[15](P26)</sup>。

考察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歌以后可以发现,他们博览群书,都以才学为诗,所资之书则无所不包,出入经史子集、儒道仙佛、稗官杂说,极为广泛,且消释贯融,用事深密。因此,一般读者就颇难理解这类作品,“后生晚学此秘未睹者,往往苦其难知”<sup>[16](P4-5)</sup>;“习其读而不知其所由来”<sup>[17](P1)</sup>。也正因为这样,为了一般读者能顺利阅读文本,理解文本,本朝人注本朝诗就很有必要,“以才学为注”的阐释方式就应运而生。

2. 孟子尚意阐释学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儒家传统的言意观一直对言辞抱着充分的信任,认为言辞可以表达思想,同样,这种信任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对理解和阐释的信任,即认为通过言辞的理解和阐释,也可以发现文字中蕴含的思想和意义。

《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认为“诗”是可以表达“志”的,同样,后人读“诗”,也就应该可以凭借文本领会诗人所言之“志”。我们再看《论语·八佾》记载的一段话: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sup>[18](卷3)</sup>

文指书本记载,献指耆旧言论<sup>[19](P1)</sup>。根据考察,“在‘文献’”一词中,“文”(典籍)的重要性要超过“献”(贤人)的重要性<sup>[17](P20)</sup>,所以,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孔子认为如果典籍材料足够充分,那么他就可以对夏礼及殷礼进行征引并能予以评说。这里依然包含着一种思路,即孔子认为,考察“文”,则可以“言”,也就是,如果典籍保存至今,那么就可以对其进行阐释,显示了对“文”阐释有效性的充分信任。

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继承了上述传统,他认为回到作者之志是一切阐释的目标,并对阐释的有效性保持充分的信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以意逆志”是一种“尚意”阐释学,但同时,“以意逆志”又隐含着阐释作者之志需要依赖于读者的主观推测,这也就承认了不同读者推测的合法性。宋代“以才学为注”注重客观笺注,旁征博引,但同时不废阐释者的主观参与,断以己意,与孟

子的影响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说,孟子的尚意阐释学给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同时,宋代经学阐释学的观念对宋代诗歌阐释影响极大,经学阐释者“怀疑批判‘正义’的权威性及其所据‘五经’文本的神圣性,力图把握圣人著述的原初‘本意’,由此而重新发明经典的原初‘本义’”<sup>[17](P200)</sup>。以《诗经》为例,宋人自欧阳修等人对《诗经》本义的追寻开始,他们相信通过对《诗经》文本的研读,可以重新把握《诗经》文本中客观存在的本义。

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及宋代经学阐释学观念让宋代“以才学为注”者认为,诗可以解,通过典故的破译、解释,可以考察文本的本义,可以知晓作者的意图,他们相信自己的阐释是有效的,是可以回到作者原意的。赵夔30年间为注苏诗,遍读群书,苏诗之“一句一字,推究来历,必欲见其用事之处”,“然后了然无有疑者”<sup>[4](P231)</sup>,就是认为自己把握了文本之义,这是阐释者自己的看法。再看读者的反映,许尹在《黄陈诗集注序》中指出任渊注解黄陈二家之诗,“为原本立意始末,以晓学者”,“予尝患二家诗兴寄高远,读之有不可晓者,得君之解,玩味累日,如梦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获起也,岂不快哉!”<sup>[3](P5)</sup>可知读者也认为通过阅读注释文本,有如从迷梦和狂醉中清醒过来,诗歌之义和诗人之意都能一一显现于眼前。

3. 知音说和前贤佳注的影响。《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条记载,伯牙弹琴,钟子期就能明白琴声所传达的伯牙的心意。高山流水,后世遂成为知音的代名词。知音难得,所以钟子期去世以后,伯牙就“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sup>[18](卷14)</sup>。高山流水的佳话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极大,首先是开启了后人对知音的渴望和重视。如陶渊明感叹“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sup>[19](卷4)</sup>,就表达了当世没有知音的寂寞,其实也隐含着对知音的渴望。其次,这一故事使后人相信自己也可以尚友古人,成为前贤的知音。《文心雕龙·知音》就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规文辄见其心。”<sup>[19](卷10)</sup>尽管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时间之河,但是真正的理解却并不是只能在传说中出现。刘勰认为,只要读者放弃成见,设身处地,有理解之同情,那么文本之义、作者之心完全可以把握。

可以说,刘勰是为“知音说”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前贤的一些精当的注本,后世流传,这也为注释者提供了现实

中的榜样。通过对诗文进行注释亦可以达到“立言以不朽”,这也是不少注者穷其毕生精力进行注疏的一个初衷,他们也希望像前贤一样通过注本而流芳百世。

在经史方面,杜预注《左传》,颜师古注《汉书》,极为成功。杜预、师古因此被称为左丘明和班固的功臣,也就是异代之知音,因为他们对《左传》和《汉书》的流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文学方面,李善的《文选注》也流传世间,广受称誉。这些都使赵夔从注东坡诗集之始,就自拟为东坡知音,并希望自己倾注心血的注本能像前贤佳注一样流传后世,而自己亦可以继踵前贤,留名青史。

从读者角度看,他们也确实把好的阐释者当成作者的知音。如钱文子《薜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云:

昔白乐天作诗,使媪读之,务令易知,而扬子云草《太玄》,其词艰深,人不能通,乃曰“后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古之君子,固有不徇世俗而自信于后世之知我者。若公于山谷,既以子云而知子云,其为之训释,则又谆谆然为人言之,是亦乐天之志也。<sup>[3](P499)</sup>

虽然山谷诗作亦颇如扬雄《太玄》“其词艰深”,难以理解,但是史容却能“以子云而知子云”,“为之训释”,也就是“以才学为注”,用浅易之词注出山谷诗歌中的艰深之意。钱文子认为史容就称得上山谷的知音。

又如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云:

古诗唐虞庚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诗,皆以刊于经,故有训释。汉以后诗,见于萧统《文选》者,及高帝、项羽、韦孟、杨惲、梁鸿、赵壹之流歌诗见于史者,亦皆有注。唐诗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数,惟杜诗注者数家,然概不为识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渊,尝注宋子京、黄鲁直、陈无己三家诗,颇称详贍。……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用功且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则于东坡之意,亦几可以无憾矣。<sup>[4](P2333-2334)</sup>

任渊注宋、黄、陈三家诗,颇称详贍,为陆游称赏;同样,施注苏诗,也因积数年之功注出东坡诗意,被陆游由衷推许。由此可见,注者当初希望以注本而使声名获得流传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 三、对“以才学为注”的评价

正如杜预、颜师古被认为是左丘明和班固的功臣一样,宋代进行“以才学为注”的阐释者也是诗家之功臣,他们对诗集的解读、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钱文子《薜室

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谓史容“于山谷之诗 既悉疏理 无复凝结 而古文旧事 因公之注发明者多矣。……而公以博洽之能 乃随作者为之训释 此其追慕先辈、嘉惠后学之意 殆非世俗之所能识也”<sup>[3](P469)]</sup>。充分肯定史容“以才学为注”对黄庭坚诗歌的解读多有发明 同时又嘉惠后学 使读者能很方便地理解黄诗。以才学为诗 诗作犹如长江大河 汪洋阔肆 气象万千 变化万状 一般人往往望洋兴叹 难以理解 但阅读“以才学为注”的注本 读者仿佛乘坐了一艘安全可靠的航船 经由文本之河 乘风破浪 直达作者本意之彼岸。

由前论述可知，“以才学为注”的出现 是受汉唐经史注疏和《文选注》的影响 但又不同于汉唐注疏之注重名物制度、古词俗语等知识性内容的训释 也不同于李善《文选注》的重释事而略释义。“以才学为注”更侧重于对诗歌中典故所蕴涵的作者意图的破解 以及作者使用典故时所采取的独特艺术思维方式 如前文所引施注苏诗的例子 阐释者在注释典故之时就非常注意联系时事 并由此获得典故的深层寓意。这种采用“以古典释今典”的做法就超越了汉代经学“以今词释古语”的传统 而其对意义的追寻也超越了汉唐经学及李善《文选注》的“释事而忘义”的弊端。另一方面 “以才学为注”在注出作者用典的 同时 也展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为一般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欣赏以及模拟学习提供了典范。

“以才学为注”这一阐释方式对文本的注释确实非常有效 而且也产生了一系列经典的注本 比如流传至今的任渊等注释的《山谷诗集注》 而且到目前为止 尚未出现可以超越此注本的阐释文本。

从阐释的有效性来看，“以才学为注”应该也是阐释苏、王、黄、陈等人诗歌最适合的方式。这种阐释方式在后世影响极大 特别是清代的诗歌阐释学 就继承了“以才学为注”的衣钵。如杭世骏在《道古堂集》卷八《李义山诗注序》中指出：“诠释之学 较古昔作者尤难。语必溯源 一也；事必数典 二也；学必贯三才而通七略 三也。”<sup>[20](卷 8)]</sup>明确表明注释文本时既须注出语典 又须注出事典 必须具备渊博的学问才能作出有效的阐释 这与宋代“以才学为注”一脉相承。同时 清代的诗歌阐释学又受当时经学阐释学的深刻影响 实事求是 注重考据。因此 有清一代产生了许多的注释精品 如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 一直流传到现在。

宋人“以才学为诗” 以故为新 以俗为雅 在诗歌创作中善于“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 手法巧妙 用事犹如己出 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阅读困难 这是宋人“以才学为注”出现的客观原因。同时 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 使宋人觉得诗可以解 而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 也使宋人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这些也是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不可不注意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 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 这既有功于作者 又有益于读者 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同时 这种阐释方式并不排斥注者的主观参与 而将客观笺注和主观心解结合则能带来更好的阐释效果。

#### 参考文献：

-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2]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任渊,等.山谷诗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6]E.D.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 [7]施元之,等.施注苏诗[O].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8]汪辟疆.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9]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10]张隆溪.道与逻格斯[M].冯川,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11]任渊.后山诗注[O].四部丛刊初编本.
- [12]李壁.王荆公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3]黄希,黄鹤.补注杜诗[O].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14]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5]何晏,邢昺.论语注疏[O].十三经注疏本.
- [16]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 [17]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8]吕不韦.吕氏春秋[O].诸子集成.
- [19]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0]杭世骏.道古堂集[O].续修四库全书.

[责任编辑:谢雨佟]